

為甚麼是茶館

陳方正

《二十一世紀》當初提出來的「茶館」理念，是它之所以能辦得起來，所以能繼續存在與發展的大前題。我以為，「茶館」必須先有館，也就是一個通過出版而建立的言論空間；然後還要有茶，也就是在此空間提供的服務，以使大家坐得舒服，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各自暢所欲言。我們認為茶館理念值得提倡，最根本原因就是在於它有助建立平衡的文化生態，能為中國文化培養活力與潛能。

十年前我們創辦本刊，宣稱希望它「對中國思潮的醞釀和發展能起些微作用，但決不希望它只用一個聲音呼喊，只依循一個方向前進。它所扮演的角色應當類似一所茶館、一個咖啡座」。轉眼十年過去，《二十一世紀》在這期間是否真正實現了上述理想自然還有待廣大讀者評定，但對編輯室同事以及編委會同仁來說，則毫無疑問，那始終是我們竭誠追求的目標。然而，我們當初所提出來的「茶館」理念，到底只是一種信仰，抑或有更深刻的根據呢？坦白地說，這在當日並未曾經過深入討論，在其後的歲月中，也沒有再認真去反省。大家接受這理念，認同這理念，好像是十分自然，甚至有點任憑直覺的事。現在，在慶祝《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年，人類也即將跨進二十一世紀之際，重新審視和探討這個理念，似乎是適當時候了。

一 茶館是甚麼？

但這樣做，恐怕不免會引起一些疑惑，甚至一些誤會：所謂茶館理念，說到底其實不就等於言論自由？難道到了今天，這一點還需要重新討論不成？這個疑問，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不錯，言論自由當然是我們所擁護、贊成的基

本原則。《二十一世紀》之所以能辦得起來，所以能繼續存在與發展，就是以這一原則為大前題，那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中辦刊，與在同一本刊物之內提倡多元性格，百家爭鳴，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西方社會有言論自由，而具有鮮明政治或意識形態旗幟的報章、雜誌如《保守評論》(*Conservative Review*)、《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費加羅報》(*Le Figaro*)等則比比皆是，而且地位廣受尊重。事實上，言論自由這一原則的功能，恰恰在於保證社會上可以聽到各種聲音，包括非常偏激的聲音，見到各種出版物，包括具有「一言堂」作風的報刊。所以，茶館理念是《二十一世紀》辦刊方針有意識的選擇，而並非由社會環境或言論自由的原則所決定。



當然，西方社會還有許多標榜「自由主義」的出版物，執言論界牛耳的主流報刊諸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法蘭克福時報》(*Frankfurter Zeitung*)、倫敦《時報》(*The Times*)、《時代》(*Time*)雜誌等大率以此自居，社會上也大都以此為其標籤，最多加上「中間偏左」或「偏右」之類識別字眼而已。而這些出版物之擁護言論自由也是自不待言的。那麼，《二十一世紀》的辦刊理念又是否可以等同於自由主義呢？

這個定位，就我個人看來，也不太對，最少是不準確的。自由主義雖然鬆散，但仍然是一套相當全面和完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理念(也可以說是意識形態)，在所有上述領域它都具有雖然未必完全確定，但大體上十分明晰的立場，這些立場是經過兩三百年來西方無數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的建構、發展與闡釋，方始形成並且成為體系的。這一體系的成就誠然令人艷羨，但畢竟仍是一意識形態；其歷史與社會淵源又如此深遠，它如何能移植到另一文化土壤中去，自亦是極複雜的問題。況且，自由主義思想體系雖然包含了言論自由，乃至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認同的理念，卻並不就等於是這些普世理念的集合，亦不可能證明就是這些普世理念的唯一理論基礎。所以，本刊同仁之中服膺自由主義者雖或頗不乏人，我們的共同辦刊理念雖然亦包括支持言論自由(以及上述其他普世理念)，但此辦刊理念與自由主義(或者任何其他思想體系)卻仍然是不同的，也決不可混為一談。

那麼，茶館理念所代表、所提倡的，到底是甚麼呢？我以為，從字面上去尋求答案就夠了：「茶館」必須先有館，也就是一個通過出版而建立的言論空間；然後還要有茶，也就是在此空間提供的服務，以使大家坐得舒服，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各自暢所欲言。至於誰對誰錯，誰高明誰沒有道理，開茶館的人

1999年5月5日，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北京西山大覺寺之會：(左起)樂黛雲、袁偉時、龐樸、陳方正、林毓生。

不需要，也不應當作出判斷——當然，他總希望這家茶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但這主要只能由過客的選擇決定了。

二 到底為甚麼要辦茶館？

說清楚了茶館不是甚麼和是甚麼，就應當談到，到底為甚麼要辦茶館了。《二十一世紀》是「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但建設總得有藍圖，有計劃，有步驟，總不能單憑高談闊論來達成。所以，以茶館來比喻文化建設，總不免令人感到詫異。要說明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也許可以從一則拆水壩的風波談起。

與中國恰好相反，美國大西北水電資源十分豐富。哥倫比亞河上游的蛇河在60、70年代建了四座水壩，其發電量足供像西雅圖那麼一個國際大都會兼航空業與軟件業中心常年之用。但最近卻出現了強大的全國性運動，要迫使聯邦政府動用11億美元拆掉這四座水壩，至於白白損失的龐大發電量卻非所顧及。說來奇怪，這為的只是三文魚，因為三文魚出生後必須順流而下進入太平洋覓食，成長後又須逆流而上回到原生地產卵繁殖，橫互河道上的水壩嚴重阻礙這往返旅程，令其產量不斷下降，乃至有滅絕之虞。專家研究之後認為，要徹底解決問題，只有拆掉水壩讓蛇河重新自然地暢流。從經濟角度衡量，拆壩肯定不划算，所以運動的焦點是環保，也就是保持大西北自然生態的完整與平衡。這可以說是環保與經濟對立的典型例子。

拆壩運動的是非本身我們自不必在此理會，要理會的是，在現代社會像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那麼兩個大原則尖銳對立而且孰為更重要，並不可能根據更高的實質性理念來判斷。拆水壩的衝突最後只能通過政治角力解決，至於解決途徑到底是明智抑或愚笨，則最少大概得等到二三十年後才會看得出來。換言之，現代社會有許多重大問題是無法根據現成理念來剖析和判斷的：無論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所謂社群主義對於這經濟與生態之爭，都可以說是毫不相干。而且，諸如拆水壩這樣令人困惑的事件，現在已經再不是偶然出現的特殊問題，而是經常爆發的挑戰了。例如，有可能培育成各種人類器官的所謂幹細胞(stem cell)研究是否應當全面展開，經過基因改造的食物原料是否應該有特殊標籤，等等，就都是與拆水壩一樣具有激烈爭議性而不可能有明晰答案的問題。

由科技迅速變革與全球商業發展所塑造的現代社會是瞬息萬變，極為開放的，在沒有整體理念、體系可作指引的情況之下，對未來社會的選擇誰也無法判斷。現在中國正面對這樣一個世界，或應當說即將融入這樣一個世界，而其所急切需要的，顯然是多種意見之長期爭鳴，而非某一種理念的單獨發展。所以，不具有任何特定方向或實質內涵的茶館理念，可以說是從我們對現代世界本質的了解與判斷而來。我們不認為現在，甚至在未來三十年、五十年間，會有那一種思想、那一種體系是可以長期與全面地指導、掌握或涵蓋現社會發展的。因此，茶館意識與理念，也正就是最適合中國文化建設之需要的。

三 我們需要「重新發明輪子」嗎？

可是，相信有不少人會感到，以上的論證有一個基本缺陷：它雖或適合西方社會或者未來的中國，但對今日仍在發展中的中國卻陳義過高，並非當務之急。在中國，建水壩猶來不及，怎麼會需要考慮諸如拆水壩那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今日十萬火急，真正等待解決的，是如何推進與深化改革，如何趕上發展國家行列等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先進國家早已經有現成範例、現成答案了，再要把它們拿到茶館中討論不休，難道真是要「重新發明輪子」不成？

這一質疑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思想界在整個二十世紀最普遍，亦最根深柢固的傾向與想法，即中國積貧積弱已久，必須盡速在現成的方案之中選擇進步典範，找尋出路。當然，這種焦急有其現實意義：正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警覺、努力與發憤，在本世紀初為國人帶來了新的精神面貌，也為中國帶來了生機。可是，倘若說在二十世紀前半中國的危機是明顯而急迫的，找尋救亡之道刻不容緩，那麼在二十世紀後半，情勢其實便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從50年代開始，中國雖還困難重重，但其實已經贏得了抉擇的餘地。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為中華民族這麼龐大的一個群體尋覓繼續前進之道是極其困難的：在眾多可能性之中最佳選擇往往泯沒不彰，往往要經歷二三十年之久的摸索才會逐漸變得明顯，才能為在位者發現，為國人共同接受。而在摸索階段倘若缺乏茶館空間，倘若沒有讓國人經歷充分的思想醞釀，那麼其後果可能是極其危險和災難性的。

然而，質疑者不可能不反駁：二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事實上已經證明正確，所以道路其實已經找到了，當前急務乃是深化和貫徹已經停滯下來、甚至已經開始變質的改革，這和茶館理念仍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這種看法也許有其道理，但也還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從蘇聯解體，震盪療法徹底失敗，以及俄國今日的困境，可以看到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並推行相應體制改革，是長期、艱鉅而沒有現成途徑的大事。要完成這樣一樁關乎十億人民的大事不但目標重要，手段、方法亦同樣重要，而且表面上最堅決、直接、迅速的途徑並不一定就最便捷平坦。譬如，中國和俄國所選擇的，就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改革之道，要判斷這兩條道路孰為優勝，今天恐怕還不可能。德國的統一可以說已為東德的改革提供了最理想條件：典範、手段、資金、計劃、人民意志乃至實行機構、人員都已具備。可是，以如此理想條件，十年之後德國的改革依然充滿問題與困擾，依然未曾圓滿結束。相比之下，人口為其三倍至十倍的中國和俄國，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是複雜、龐大太多了，簡直不可以道里計。這樣的一樁百年大業，怎能說是只須認定目標，同心協力前進即可，而不需要長期的討論與醞釀呢？

況且，中國與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今日已經縮小，二者的問題因而也變得更相似了。英國在60、70年代由於過份強調社會福利與正義所陷入的嚴重經濟危機，以及日本今日由於金融體制保守、不健全而遭逢的長期停滯，都會提醒我們：接近前列則競爭必然更劇烈，求繼續改進也更困難。這是從模仿、跟隨

階段過渡到探索、創造階段所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如所周知，美國今日之領先世界，最基本因素在於其創造力，而創造力之出現不能單憑意志、毅力與苦幹，更有賴於不同思想之相互衝撞與激發。那也就是說，與茶館理念是息息相關的。

四 建立文化生態的平衡

在此，我們不妨再次回到拆壩問題的啟示。環保有其直接經濟動機，即防止竭澤而漁，保證「可持續」發展，但拆壩與否不能以經濟核算解決，表明它有比經濟更深刻的意義。這就是維持「生態平衡」，亦即避免擾動大自然中所有生物通過生存競爭而建立起來的相互依存與剋制關係網絡，以求保存「生界」(Biosphere)的活力與進化潛能。「生界」如是，思想與文化亦然。戰國的百家爭鳴與五四的思潮澎湃為中國文化帶來了生氣、活力與轉化契機；甚至到了大一統皇朝時代，中國的思想亦未嘗完全定於一尊：儒、法、黃老三家固曾迭為更替，然後又互為表裏，至於儒、釋、道三教此消彼長，不斷相互滲透、影響，更是眾所周知。

換言之，無論在其形成抑或發展、成熟階段，中國文化都不能說是單元的，而是由多種相互競爭的異質成分所組成的集合體，其活力與生機，正就存在於此多元性與複雜性，亦即其文化生態之平衡中。中國如是，西方亦然；傳統社會如是（雖然在其文化生態中有一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如中國之儒家與西方之基督教），現代社會則更為變本加厲：它已進入所謂「解魅」，即不承認有任何權威或宰制性原則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的本質與特徵就在於其思想之多元與不斷醞釀、不斷競爭。不正視這本質，而去追求類乎聖杯(Holy Grail)那樣的解決一切之道，則「彼岸」將始終是個幻象。我們認為茶館理念值得提倡，最根本原因就是在於它有助建立平衡的文化生態，能為中國文化培養活力與潛能。

最後，我們還得強調，《二十一世紀》所能夠發揮的，只不過是知識份子許多功能之一面，即是促進其思想之交流、醞釀，這對中國的文化建設應當有若干幫助，但這本刊物並不可能同時承擔許多其他同樣重要的功能，例如專門學術研究之促進，大眾文化意識之塑造與引導，為實際改革提供意見或者設計具體方案，等等——那些應當是專門學刊、大眾媒介以及專家學者的責任了。現代社會是非常複雜的有機體，它的分工有許多不同層次，而知識份子及其言論的作用可說是虛之又虛，間接又間接，與具體問題、事務相隔不知多少層次的了。雖然如此，它對社會整體還是有一定影響，還是有一種呼喚、提醒、刺激作用，那是無疑的。我們希望社會不要忽視這作用，但也不願誇大這作用。我們認為，要充分發揮這作用（而不是其他同樣重要的作用），最適當的辦法便是秉持茶館理念（而不是其他更實質性的理念），來辦《二十一世紀》這樣一份刊物。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